

第六章

放出黄水

掘堤工程易地，百姓群起抗议，奉命掘堤的新八师虽然在抗日战争中屡立战功，但最终却与花园口连在一起，与人工制造的黄河大泛滥连在一起，与花园口掘堤一道载入中华民族多灾多难的历史。



1. 蒋师长建议获批准,熊处长连夜测地形

赵口第一次掘堤失败之后,商震曾于6月6日命令担任杨桥至郑州黄河铁桥间河防的新编第八师,派步兵一团,前往赵口协助掘堤。但新八师师长蒋在珍并未立即派部队前往,而是与师参谋处处长熊先煜乘车沿大堤驰往赵口,准备先探明情况,再派部队前往协助掘堤。

蒋在珍来到赵口,第五十六师潘必强团和蒋桂楷工兵营均在进行第二道缺口及坑道的施工。第一〇九师刘文茂团仍在挑挖第一道缺口。宽不过30余米的大堤上已是人满为患,而新辟之掘堤工程能否成功,尚难预料。蒋在珍和熊先煜在堤上转了一圈之后,便驱车至崔庄集团军总司令部,向商震报告在堤上见到情况。

商震正忙于布置东漳至中牟以南的防卫作战,同时为赵口不能按计划放水而十分焦虑。见蒋在珍赶来总部,以为他有了什么好的掘堤计划要向他报告,连忙丢下手中工作,问道:“蒋师长对掘堤放水有何高见?”

不料蒋在珍却说:“商总,依在下之见,赵口掘堤不成,不是兵力不敷,而是措施不当,比如掘堤时开口太窄,待挖至底部,仅容一人通过,出现塌方后,又因缺口两壁陡峭,士兵无法立足,似此怎能成功?”

“这些情况,刘军长已向我报告过了,你的意思是……”

“在下以为,赵口现在已有两个团,再加上一个工兵营,兵力已3000有余。而堤坝狭窄,采取轮流作业办法,一道缺口每次仅能投入两个连。再增加兵力,也无用武之地。”

蒋在珍说出来意后,商震脸色顿显不悦——原来他是不想派部队协助掘堤。商震略一沉吟,说:“这样吧,你现在仍回赵口,协助刘军长改善掘堤办法。一旦需要增援,你立即派一个团赶往赵口。”

蒋在珍一时找不出什么推托的理由，只得与熊先煜重返赵口。

路上，蒋在珍起先有些闷闷不乐，后悔不该来总部向商震说出自己的意思，因为他无异于叫总司令收回成命。早知仍要返回赵口，事先不如不来。当然，他不好将此意向参谋处长说出。后来，当吉普车快要到达三刘寨，大堤已经在望的时候，他脑中突然形成一个新的设想，那就是易地掘堤。这个设想使他心中的不快一扫而光。

蒋在珍和熊先煜回到堤上，已是薄暮时分，刘和鼎已返回杨桥军部，各级监督指导人员也多已到三刘寨去吃晚饭。堤上仅有魏汝霖与两团的团长在施工地点督工。

蒋在珍心想，魏汝霖是总司令部的参谋处长，如果由他向总司令转呈自己的设想，要比自己直接去说较为妥当，也容易引起总司令的重视。因为另择地点进行掘堤乃是大事，说不定还要报请长官部，甚至军委会的批准。打定主意后，他便将魏汝霖喊至一旁，先寒暄道：“汝霖兄连日来亲临现场督工，不舍昼夜，实在辛苦啊！”

“‘以水代兵’关系到整个抗日战略，在下岂敢有片刻偷闲，在珍兄不是也忙得马不停蹄吗？”魏汝霖笑道。

蒋在珍哈哈一笑，口气忽转严肃说：“汝霖兄，我对掘堤一事有个新的设想，不知是否能够付诸实施。”

“请说说你的高见。”

“现在，在堤上施工的部队已有两团一营。人数已逾3000。但是商总司令仍命敝部再派一团增援。我想，施工现场受堤身宽度所限，一次不容投入更多的人力。再增派部队，也只能在堤下等候换班作业，恐大批人力因此浪费。而第一次掘堤已经失败，新的缺口是否能够出水，尚难预料。”

“依你之见……”

“我以为，与其重复投入兵力，不如另行选择地点，再掘一道缺口，这样既不影响赵口的掘堤进度，同时，又增加一层成功的希望。”

“你打算在哪里掘？”

“敝部防区内的花园口，河堤下地形也颇为低洼，且有索须河与贾鲁河相通。大堤一旦掘开，河水可由索须河注入贾鲁河，不但堤下村寨可少受损失，其泛滥阻敌的功效，与在赵口掘堤也无什么区别。”

“好，好，在珍兄此计不仅切实可行，而且是卓有见地呀。”魏汝霖拍掌叫道。

蒋在珍见魏汝霖表示赞同，即不失时机地说：“既然汝霖兄认为愚见可行，

请兄不妨代为转呈总部，征求一下总司令的意见。”

“可以可以，我现在就去打电话请示。”

魏汝霖说完，便到堤下临时搭设的施工指挥所去打电话。蒋在珍和熊先煜无事可干，便在掘堤工地附近来回溜达。

片刻过后，魏汝霖回到堤上，告诉蒋在珍：“我把你的建议转告启公，启公表示同意，但他说此事还需待请示委员长后再定。”

此刻暮色渐浓，天空已转暗蓝，黄河滔滔浊流已呈古铜色。堤下村落中百姓大多已经迁避，特别是靠近河堤的庄户，既不闻鸡鸣狗吠，也不见灯光，于沉沉暮色中，看上去犹如黝黑的树林或阒寂的荒冢。即使有些村落中仍闪烁着一两星灯光，看上去也令人顿生凄凉之感。蒋在珍、熊先煜与魏汝霖3人立于堤上，迎着凉爽的河风，谈起抗战以来各自的经历与见闻，不禁感慨万千。

8时许，忽闻堤下指挥所值班人员喊：“魏处长电话。”

魏汝霖一笑，说：“肯定是启公打来的，可能委员长已经同意老兄的建议。”说完疾步走下河堤，去接电话。

蒋在珍急于想知道请示结果，也与熊先煜尾随而去。

魏汝霖“嗯、嗯、是、是”地接完电话，对站在一旁的蒋在珍说：“启公说，他已请示过委员长，委座对在花园口掘堤表示赞同，并命令你们连夜进行。你们快回去准备吧。”接着，他又开玩笑道，“在珍兄，等你掘堤成功，受奖领赏的时候，不要忘了请我喝一杯啊！”

蒋在珍口中答道：“一定，一定。”当即辞别魏汝霖，与熊先煜驱车赶回师部所在地——京水镇。

京水镇地处郑县境内，位于花园口东南3公里，因靠京水河而得名。汴郑河堤公路，沿黄河大堤自六堡下堤，过京水镇直达郑县北关。北面两公里，即是黄河。由于水陆交通颇为畅达，京水镇自清末起便逐渐繁华，后成为郑县四大镇之一。镇内有东西南北大街和二爷庙、乡寓街、大王庙街等较大街道。大街两旁，店铺相连，商业景象颇为繁荣。镇周围筑有坚厚的土寨墙，周长约5华里。寨墙四角筑有土炮台，四门为砖石砌成，大门为厚木铁叶制就，颇为坚固。镇内居民约两千余人。

新八师师部设在镇西面一所四合院内。这所四合院前面是围墙门楼，院内东西两侧各有三间厢房，上房前有走廊。庭院整洁宽敞，全部房屋均为青砖小瓦砌筑而成。房东乔学文夫妇与母亲靠种地为生。师部设于乔家之后，一家三口移住在东厢房内。师长蒋在珍办公住宿均在上房，院门口设有双岗，除乔家人之外，其余百姓，非经允许，一律不准擅入。一次乔妻外出磨面，回来时，门岗已换。新

上岗士兵不认识乔妻，将她拦在门外。她再三说自己乃房东之妻，就住在院内，士兵仍不放行。后来蒋在珍闻门外有吵闹之声，出来察看，证明她确为房东之妻，她这才得以进门。

蒋在珍和熊先煜回到师部，已是夜10时左右。由于下午两人往返于崔庄与赵口，后来又等待商震的命令，误了饭时，均已饥肠辘辘。熊先煜即嘱咐勤务兵办些简单饭菜，供两人充饥。饭后，蒋在珍即召开师部幕僚会议，商定具体掘堤地点和措施。

在从赵口返京水途中，蒋在珍就问过熊先煜在哪里掘堤最为合适。熊先煜说：“以地形而论，马渡口、花园口两地均可。不过马渡口与赵口相距不远，敌人容易接近，为争取较充裕的时间，在下以为在花园口掘堤为宜。”

蒋在珍对他的建议表示赞同。

但掘堤一举，事关重大，而且有一些具体措施需要布置，他认为还是召集师部幕僚开会决定为妥。

会议正进行间，魏汝霖奉商震之命，乘车赶来师部，参与商定掘堤一事。

会上，大家一致认为将掘堤地点定在花园口为宜。蒋在珍决定，由第二、第三两团与师属工兵连执行掘堤任务，第一团担任花园口以东防卫，掩护部队掘堤。由黄委会张段长负责召集附近百姓协助施工。并于翌日与在郑州的省民政厅厅长方策长川联系，请他派员放赈，通知堤下居民搬迁。

具体方案制订后，蒋在珍即命熊先煜主持掘堤事宜，带人连夜前往花园口测定掘口位置。师长本人则负责于当夜调遣部队，于翌日晨开赴花园口，动工掘堤。

散会之后，已是午夜，魏汝霖当即将会上所拟关于掘堤的决定，以电话报告商震。熊先煜则率营长黄映清、工兵连长马应援、黄委会张段长，乘车前往花园口测定掘堤位置。

花园口是一个仅有数十户人家的村庄，距郑州以北18公里，北临黄河，南濒贾鲁，西望广武岭（即邙山）。地理位置为东经113.39度，北纬34.90度。地形仍属平原。但由于花园口段黄河河槽高出地面一至三米，成为地上悬河，在历史上多次决口，造成地势低洼，沼泽密布。花园口附近，有索须河流过。索须河分南北两支，南支发源于密县，经京水镇以南，折而向东南流至大河村，与贾鲁河相汇。

花园口地名的形成，起于明代。据《花园口地方志》记载：“宋代曾于此建闸治水，河工员司遂营房造室，渐成村落，初名为‘桂家庄’。迄至明朝，有天官许某（经考证是许赞，河南灵宝县人）在此修葺花园一座，方圆五顷四十余亩，种植四季花木，经年盛开不谢，远近男女争往游览，此后船渡频繁，‘花园口’之名遂闻于世。”

花园口距广武岭仅15公里，此段河床正处于河水冲出峡谷，进入平原的首冲地带，黄水如挣脱锁链的猛兽，横冲直撞，一遇洪峰，便有决口之虞。仅花园口东面长约18公里的堤段，于近百年间就已决口3次，给百姓带来十分惨重的灾难，使得花园口一带百姓谈河色变。民谚有“黄河四十五里吸人”之说。

熊先煜带人乘车来到花园口河堤，已是7日凌晨。一弯残月，穿行于纤云之间，夜色茫茫，四野阒寂，宽阔的河面隐于黑暗之中。借着暗淡的月光，可见堤下流水源源东去，水浪拍岸之声，清朗可闻。大堤南面的水洼草丛之中，蛙鼓虫鸣，阵阵传来。各村百姓均已进入梦乡，视野之内，不见一星灯火。

熊先煜等人下车之后，便沿河堤察看水位与地形，不料4只手电筒不仅光线微弱，而且撒亮不多时，灯泡便先后烧坏。没有手电筒，无法看清水位，使掘堤定位工作无法进行。

这时，黄委会张段长要凭自己的经验选定掘堤位置。熊先煜认为掘堤事关重大，不可盲目选定。又有人提出，要开车返回京水镇去取照明工具，熊先煜看了一下怀表，见已是凌晨2时许，便说：“一往一还，又要费去许多时间，与其如此，不如就在车中休息，等天亮后再行确定地点。”

于是4人便同宿车内，以座代卧，共度残夜。

熊先煜由于受命主持掘口事宜，自感肩负重任，兴奋之下，难以成眠，便在车内与营长黄映清等人谈起新八师抗战以来的经历。回首往事，大家谈兴陡生，尤其谈起新八师奉命炸毁郑州黄河铁桥一事，四人更是感慨系之。熊先煜叹道：“我们新八师炸黄河铁桥在前，掘黄河大堤于后，真可谓集破坏之大成啊！”



2. 新八师奉命“大破坏”，守国土官兵多捐躯

新编第八师兵源多来自贵州，师长蒋在珍便是贵州桐梓人。卢沟桥事变时，新八师正在崇阳、通山、通城一带整训。事变消息传来，全师官兵愤怒声讨日军侵略罪行，一致请缨赴华北前线参加抗战。是年9月，该师奉命开赴河南许昌待命，归驻开封第一集团军战斗序列。部队到达许昌后，奉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刘峙之命，担任许昌城防，并守卫平汉铁路漯河至新郑段及陇海铁路荥阳至潼关段，维护交通安全。不久，师部移驻郑州，先驻西北营房，后驻火车站附近的中国银行。

1938年，保定方面日军沿平汉铁路南犯，石家庄、邯郸等地相继沦陷。新八师奉命配属于李仙洲第九十二军，北上增援漳河。该师即从郑州乘火车赴安阳。部队到达新乡时，李仙洲又改令其维持新乡、焦作两地警备区秩序。

新乡位于平汉、道清两铁路相交处，北制安阳，南扼黄河铁桥，又是西通晋南之捷径，为豫北之战略要地。2月8日，日军第十四师团主力以夺取新乡为目标，继续南犯。日军飞机连日轮番轰炸新乡火车站和黄河铁桥。2月14日，日军出动飞机15架，首次轰炸郑州，火车站及大同路附近商业区，房屋被炸毁500余间，死伤居民200余人。后来，敌机数架轰炸黄河铁桥，遭到新八师部署于桥南端邙山上的高炮部队猛烈射击，胡乱投下几颗炸弹，仓皇北逃。

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根据日军阻我北援新乡的企图和进犯中原的态势，命令新八师戍守黄河北岸的铁桥桥头堡及南岸铁桥东西一线河防，并做好随时爆炸铁桥的准备。

不久，新乡失守，宋哲元部主力沿道清铁路西撤。2月17日，敌进至新乡以南的小冀镇，于形势急趋紧张之际，新八师奉第一战区长官部之命，将建于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的长达4000余米的黄河铁桥炸毁。

新八师爆破黄河铁桥的经过情形，熊先煜在他的抗战日记中记载得颇为详细：

二月十二日 星期六 晴 郑州

本师奉程长官命令，由郑州进驻黄河铁桥南北两岸，处理并准备一切。忙无休息，晚间分别致书守瑛表叔，伯雍、远志、南薰、应援、治堂、代蕃诸兄，告以移防情形，且谓原拟借征兵机会，返黔省亲，近新兵已由黔出发来豫，兼之任务繁重，不克分身，业已打消回家念头，努力杀敌报国也。

二月十三日 星期日 晴 黄河铁桥车站

十四时随师长蒋在珍将军，乘火车由郑州发出，同行者副官郑自襄及特务连士兵一排，经广武县境到黄河南岸车站，驻第二团团部驻地，该团前日由新乡开来，守卫黄河快桥。

指挥所除郑副官办理杂务外，一切由余一人负责。到后，即计划部署防务，并处理诸事，师长对余有所指示或咨询时，先命就座，此为平常对部下所少见者。入暮，奉令往晤独立工兵第一团第一连连长周玉旋少校，询问爆破铁桥准备情形。据称，该连已开来三日，准备业已完成，对于所负任务，确有把握。该连距本部约四里，归已二时左右，始得安眠。

漳河以北之敌，连日沿平汉线南犯，我二十九军各部队迎击于安阳、汤阴、汲县各地，战斗异常激烈，我军逐渐南移。敌已由汲县南下，大有直趋新乡而进犯中原之势。本师此奉任务，为固守黄河铁桥南北岸，并掩护破坏黄河铁桥，战地生活，甚觉痛快。

二月十四日 星期一 晴 黄河铁桥车站

上午两次警报。余侦察敌机行动，闻爆炸声甚烈，车站附近，亦受震动，料敌机轰炸郑州也。嗣接郑州电话，知敌机十几架轰炸郑州，车站附近及大同路损失甚重，死亡亦多，师部北侧球场落三弹，对面中国银行亦被炸，官兵幸而无恙。

午后一时许，随师长乘手摇车赴黄河北岸视察阵地，尚有营长刘荫培，副官郑自襄及士兵二人随行。隧道附近驻有重炮兵一连，炮二门，铁桥上有本师士兵驻守，并有高射机炮二挺。英勇将士严阵以待，目前被敌机炸坏第八十二孔桥，业已修复，可以行车。及抵北岸，师长接见第一团团团长傅衡中，有所指示，旋即视察桥头堡阵地一周后，返回南岸。

黄河铁桥计长一百孔，每孔约四十公尺，为世界伟大工程之一，方今倭寇侵

略，在焦土抗战下，准备予以破坏，殊觉可惜。

师长视察归来，晚间亲写《桥头堡阵地之意义战斗要领》一文，分发各部队研究。此种战地教育，师长常亲为之，故部下胸有成竹，临阵不惧，所负任务，未有不圆满达成者。

二月十五日 星期二 晴 黄河铁桥车站

今日我空军飞机十二架，飞炸安阳敌军。军民闻之，无不称庆。

本部各处派随指挥所工作人员，昨日郑州被炸受阻，今日入暮，始由参谋长朱振民将军率到。三日来，余一人办理一切，六昼夜接谈电话，说话亦感吃力，任劳任怨，聊以自慰。

豫北情况告急，闻敌我在汲县、新乡间激战中。关于破坏铁桥，奉命飭由工兵一连于夜十一时许开始装药，长官部并派工兵组长某，前来指导技术事项，待命破坏。

二月十六日 星期三 大风 黄河铁桥车站

五时，奉程长官命令，本师指挥并掩护工兵破坏铁桥，固守北岸桥头堡阵地。师长当令傅团长率步兵四营，占领并固守北岸桥头堡阵地，李昌荣团长率二团两个营及师部直属部队，并配属之炮兵部队，固守南岸，严令官兵与阵地共存亡，纵余一兵一卒，亦不得擅行撤退。

十一时许，发生警报，有敌机一架盘旋铁桥高空侦察。斯时狂风怒号，尘埃漫天，旋即逸去。嗣后据报，铁桥中央有哨兵一人被风吹入水中，惨遭灭顶，其风之大可知。

午后二时，九十五师师长兼郑州警备司令罗奇将军来，与师长会商，传示委座命令并各地战况如下：

（一）长官部参谋长晏勋甫将军已驰赴新乡，与宋哲元将军计划拒止南犯之敌。破坏铁桥，须待委座命令。

（二）津浦南线我军告捷，已将抢渡淮河之敌歼灭或击退，收复凤阳。蚌埠已亦有克复说。

（三）山西方面，我军业已出击。

（四）平汉线，敌我仍在汲县新乡间对峙中，恐敌此时不能南犯，故破坏铁桥之举，尚在未决中。

到了晚上情况转变，宋哲元部将沿道清路向西转移，奉程长官命令，拂晓时开始爆炸铁桥，余监督执行此项任务，整夜未眠。

二月十七日 星期四 大风 黄河铁桥车站

我和参谋长守候在车站北侧，等候新乡南开之最后列车通过铁桥，然后即行发出爆炸铁桥之信号。午前五时，最后列车到了，满载着铁路员工及器材家具。这是平汉路最后的一列车，我注视着它，从铁路到车站，心里有着像读法兰西《最后一课》同样难过的感觉。

五时一刻，信号枪连发白色信号弹三发，开始爆炸黄河铁桥，一声震天地，据报仅破坏三孔而已。大致因气候与技术关系，未竟全功。此时天色鱼白，前方情况不明，新乡以南又无我军，地属平原，铁轨又未破坏，甚利敌机械化部队之行动，深虑敌人逼至，任务难以达成。余随师长乘手摇车到桥上视察，风沙不减昨日，黯然无光，当严令工兵继续进行爆破，并派员渡过北岸，传令傅团长固守阵地，非有命令不得撤退。

十一时一刻，发生警报，敌机二架轰炸铁桥，此可判断敌人尚不明我已自动破坏，而欲阻止我军北援，并断宋军归路，我防空部队对空射击，一时炮声隆隆，旋又有我机十三架，经铁桥上空，飞新乡以北助战。

伟大的黄河铁桥，功在人民与国家，今天为了战略关系，不能不忍痛破坏，我们还来担负指挥监督执行爆炸的任务，以前谁也没有想到此事。惋惜之余，敬祝抗战胜利，短期内能把新的黄河铁桥重新建筑起来。

二月十八日 星期五 晴 黄河铁桥车站

爆破铁桥，今天仍加紧继续进行中，车站附近居民及各种办公人员，都纷纷迁走，只剩下少数的贫穷老百姓，而来来往往的全是荷枪的抗日战士。

数日来日夜忙碌，睡眠不足，感冒加重，声音嘶哑，咳嗽不已，颇感痛苦，幸军医主任陈金城兄来，服药一剂，好一点，但决不因病而怠懈自己工作。

据郑州《号外》报道：本日上午十二时许，敌机三十八架，前后袭击武汉，我空军起而应战，奋勇交接，死力周旋，结果击落敌机十一架，我亦损失驱逐机四架，此为武汉空战以来之空前纪录。市民欣喜若狂，热烈庆祝，并慰劳我空军将士。另悉敌机九架进袭重庆，在广阳坝投弹十二枚，则四川亦开始受敌蹂躏也。

二月十九日 星期六 晴 黄河铁桥车站

余于午前十时许，驰赴黄河铁桥，视察爆破情形，沿桥而行，查知自三十九孔起至八十二孔止，其间均已破坏；有桥床爆倒者，桥柱爆坏者，桥床桥柱均爆落水者。浩大工程，毁于三日夜内。摄影数张，以为纪念。余视察完毕，已十二时，返至南岸桥头，仰视桥之右栏上，有一铁碑文。曰：

“大清国铁路总公司建造。京汉铁路，由比国公司助工。工成之日，朝廷特派太子少保，前工部左侍郎盛宣怀，一品顶戴，署理商部左丞唐绍仪行告成典礼，谨镌以志。时在光绪三十一年十月十六日。”

二月二十日 星期日 阴晴 黄河铁桥车站

敌人于攻占新乡后，继续沿道清路西段压迫我军，并未沿平汉南路，因此我们得安全达成爆炸任务。

晨，晏参谋长莅铁桥视察，当令停止爆破，本师北岸部队亦奉令撤回南岸，任务始告完成。

师长嘱余撰拟“爆破黄河铁桥记”如左，缮写于铁桥影片后，以为纪念。

“暴日谋我日急，卢沟桥事变因以发生，为求我领土主权之完整，遂发动全面抗战。在第一期抗战中，我蒙损失甚巨。自二期抗战开始，敌打通津浦线之计划失败，乃改犯平汉，企图席卷黄河以北，进入中原。时师部驻守郑州，一、二两团驻守黄河铁桥，构筑桥头堡阵地。二月十二日奉司令长官程令，全部移驻黄河铁桥附近指挥所部，担任北岸桥头堡阵地之构筑与守备，而于铁桥之守护，尤负有重大责任。十三日午后三时，率部乘车赴守地部署一切。十六日，狂风怒吼，尘沙蔽天，敌、我在新乡以北地区激战，我因战略关系，宋军各部向山西转移。本师复奉司令长官命令，固守桥头堡阵地，掩护工兵破坏铁桥，另由独立工兵一团一连担任爆破。当命傅团全部及二团二营固守桥头堡阵地担任掩护，李团及直属各连固守南岸。十七日午前五时一刻，开始爆破，殊以技术关系，直到二十日晨，经晏参谋长视察后，始告停止。计自三十九至八十二孔，均行破坏，于是号称世界伟大工程之黄河铁桥，徒留得残痕几许，念缔造之艰难，知修复之不易，爰摄斯影，以志不忘，且益坚我抗战到底之决心。”

新八师完成爆破黄河铁桥的任务后，奉命守卫西起铁桥东至马渡口的河防。师部移驻京水镇。

时隔不到4个月，新八师便又要挖掘黄河大堤。一座黄河大桥固然工程浩大，但其价值尚可计算；而黄水决堤而出之后给泛区百姓造成的损失却难以估量。难怪熊先煜与诸战友堤上夜谈时，会发出“我们新八师真是集破坏之大成”的感慨了。

不过，新八师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也并非仅会破坏，在花园口掘堤之后的几年，该部也曾立下不少抗日战功。特别是在禹门战役和守卫三门峡河防期间，表现尤为突出。对此，熊先煜在他的回忆文章中做了简要的介绍：

禹门山战役

日军占领太原后,打通了同蒲路,盘踞河津,荣河各县,扬言渡过黄河进犯我西北大后方。黄河禹门(亦称龙门)乃晋陕交通要冲,为敌人侵犯西北必经之路。新八师于1938年8月奉军委会命令调到陕西,又奉胡宗南之命开赴韩城,接替第一师严明部,戒备南起芝川镇北至师家滩防务。师部驻韩城内的一所大庙内。河防以两个团守备,一个团为预备队,由第一团第一营王树骥率领的加强营占领禹门东岸及东龙门山阵地。东龙门是禹门河防的桥头堡阵地,又是阎锡山晋西抗日根据地乡宁、吉县的右翼,可见其战略地位之重要。

12月25日,盘踞于河津之敌以七八两联队及滕田大队为骨干,附以皇协军贾子庚、马子平等步、骑、炮兵四五百人,大炮20余门,由空军配合进攻东龙门山及禹门的前沿阵地神前村,战斗激烈。敌以飞机轰炸扫射,大炮轰击,掩护步兵前进,终被我击退。据村民说,他们目睹日军运回死尸百十具,伤兵亦多。

26日,敌分兵进犯乡宁、吉县阎锡山部,樊村、固镇相继陷落。阎部集结山地凭险防守,战斗亦烈。

从25至30日,日军连续以陆空联合部队进攻东龙门山。此时天寒地冻,白雪铺地。日军身着白色伪装,分两路进犯。一路从神前村欲占东禹门渡口。我军以密集火力阻击,在西岸由阎锡山配属我师的野炮营亦发射数十发炮弹支援,打退了敌人多次冲锋。虽然我守卫龙门山麓岩洞的一个加强排全部壮烈牺牲,但禹门口阵地始终在我手中。敌另一路猛攻我东龙门山,以山顶云中寺为目标。我军居高临下,以逸待劳,充分利用防御工事,步步设防阻击,顽强战斗,打退了敌人的数十次冲锋,敌人伤亡惨重。我五营官兵伤亡也达百分之七十以上。其中守卫云中寺的一个加强排,誓与阵地共存亡,全排官兵壮烈牺牲。排长耿甲臣,察哈尔省延庆人,黄埔十六期生,高举右手大呼“中华民族万岁”而殉国。机炮连陈连长,贵州人,在该连士兵伤亡惨重之际,射手阵亡,他接过机枪扫射来犯之敌,身中四弹,倒在血泊之中达三昼夜,我军收复龙门山后才得救护,虽幸免一死,但已成重残。

我云中寺及关帝庙营指挥所一度失守。师部速派第一团三营冉云翹部翻山越岭,兼程前进,由师家滩渡河增援王营,从龙门山侧面发起攻击,于30日收复龙门山阵地。此役使敌人渡河进犯西北和扫荡阎锡山晋军根据地的企图惨遭失败,不得不仍龟缩于河津、秸山等地。据群众反映,日军在河津城隍庙焚化尸体五六日,浓烟滚滚,臭气冲天。

这一战役,我王营阵亡连长以下官兵271人。军官用白绸,士兵用白布裹身,合葬于东龙门山麓。

守卫三门峡河防

1939年2月,新八师奉命归第九十三军建制,由韩城徒步赴华阴,改乘火车东出潼关,抵河南渑池,继在南村渡过黄河,进驻山西沁河两岸的沁水,安泽等县境内与敌作战。历经4月攻势,进攻安泽、浮山,及7、8月晋东南反扫荡诸役。1940年,与八路军、决死纵队互通情报,协同作战,又经历了沁水、紫沙腰诸役和百团大战的高平战役等。此间,阵亡团长王树骥(贵州遵义人)、黄映清(贵州三穗人)等官兵一万余人。其中河南籍士兵众多(新八师遗缺除由贵州遵义地区募补志愿兵外,在山西、河南期间,由河南鲁山、临汝、许昌师管区招募了许多志愿兵。河南乃抗战前线,群众同仇敌忾,踊跃参军,支援人力很多)。

1941年夏季,太原故酋调集日伪军大举扫荡晋东南,企图歼灭我九十三军。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向重庆军事委员会详报了情况,建议撤回各军,九十三军遂强渡汾河,越同蒲路,突破日伪军防线,从禹门西渡黄河,到达陕西宝鸡境内,新八师担任宝鸡警备任务。九十三军在晋东南与八路军相处融洽,此次撤离又得到他们的有力支援。九十三军撤离时,把一些储存在山区的枪支弹药等装备也留赠给了他们,支援他们坚持敌后抗战。

为防止日军南渡黄河,九十三军于1942年初又奉命开赴灵宝、陕县,守卫潼关至三门峡一带河防。乘火车经潼关北的凹道时,因其间有一缺口,敌人在黄河对岸置有大炮,通过缺口瞄准经过的火车。只要火车通过,便发炮射击。因为经过缺口时,必须在夜间加速秘密行驶,才能减少伤害,故名闯关。到达陕县后,师部驻城内,以两个团守备,一个团作预备队,定期换防,直至1942年秋奉命赴重庆担任陪都卫戍任务为止。这期间,我军在陕县一带民众的积极协助下,河防一直安然无恙。

然而,这一切,史料已鲜有记载,新八师仅与花园口连在一起,与历时8年又9个月的人工制造的黄河大泛滥连在一起。

新八师同花园口掘堤一道走进中华民族多灾多难的历史。

3. 蒋在珍名系花园口，指挥者走进抗战史

6月7日，天刚放亮，熊先煜便和马应援、黄映清、张段长等人下了汽车，沿河堤观察水情，选择掘堤地点。

行动之前，熊先煜对三人说：“蒋师长将选择掘堤地点的任务交给我们，是对我们的信任。我们选择地点，当以利于完成掘堤放水任务为原则，因为我等是军人，军人的行动目标是为了战胜敌人，保卫国家；但我等父兄皆为百姓，军人与百姓血肉相关，所以我们也要考虑尽量减少放水对人民的损害，诸位认为如何？”

黄映清等人皆表赞同。

熊先煜等人本着达成任务，少害人民的原则，经过一番观察，最后选定于花园口村以东关帝庙以西为掘堤地点。此处为河床弯曲部，掘堤后，河水易于流出，而且可经索须河流入京水镇以南之贾鲁河，利用贾鲁河以防黄水扩大泛滥，可以减少对人民的损害。

其实，这也是他们的主观判断，对于以后数年，黄水泛滥给人民带来巨大灾难，他们也实在无法预测。

熊先煜等人选择掘堤地点之际，师属工兵连与第三团第九连全体官兵已开到大堤待命。

地点一经确定，熊先煜即命部队开始施工。

熊先煜吸取了赵口掘堤失败的教训，对这次掘堤的方法做了一些改进。他将堤顶挖掘宽度扩大为50公尺，这样掘至缺口底部，预计可宽十公尺左右，待第二团全部集中，第三团由郑州开到后，熊先煜命两部由大堤南北两面同时动工，将掘起的土石向大堤东西两头发运，以提高施工效率。又命在大堤中央暂留三公尺宽，以维持东西来往交通，最后再将其掘除。

随后，熊先煜又吩咐张段长，由他带士兵数人，到附近召集百姓，协助掘堤，并由张段长指导掘堤办法。

一切部署就绪，熊先煜便驱车返回京水师部，向师长复命。

蒋在珍虽然昨夜就寝很迟，但起床仍然很早。熊先煜赶回师部时，他正准备去大堤视察开工情况。蒋在珍听完熊先煜的报告之后，对他的施工安排颇为满意，但他仍有些放心不下，便对熊先煜说：“你昨夜未能好好休息，去睡一会儿。开饭时间还早，我去堤上看看。”

但熊先煜却说工程刚刚开始，距完成任务甚远，自己无法安寝，又与蒋在珍一同乘车赶往河堤。

蒋在珍来到大堤上，见由于熊先煜采取于大堤两面同时挖掘的办法，一次可以投入更多的人力。施工规模要比赵口大得多，由于动工伊始，士兵们热情颇高，干劲也大。奉命掘堤部队均已按时开到，驻于附近村落中。大堤北侧，河水打着漩涡，滔滔东流，缺口一旦挖成，不虞无水流出；大堤南侧的地势低洼，往南一溜慢坡状，河水一旦出堤，即成滚滚而下之势。当即赞扬熊先煜择地得当，部署有方，言谈之中，对成功放水充满信心。

蒋在珍视察完毕，便同熊先煜返回京水镇。

早饭过后，魏汝霖向商震报告花园口掘堤的具体部署和开工情况。蒋在珍则移住花园口，亲自监督施工。刚从武昌军委会战时将校研究班赶回的副师长朱振民，也随蒋在珍一同前往。

蒋在珍离开师部之前，独自一人悄悄来到东厢房，同乔母说了一席话，自师部进驻乔家四合院3个多月以来，这位中将师长还是第一次和房东搭腔。时隔50余年，年近七旬的乔学文对这次谈话仍记忆犹新。

蒋在珍的名字也和新八师的番号一样，与花园口掘堤事件一起走进了历史。在这一历史大事件中，蒋在珍可谓充当了一个颇为重要的角色。本书理应对此人的简历有所介绍。然而作者跑了几家图书馆，查阅了许多资料，也未找到关于蒋在珍的介绍。后来仅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存的国民党军某部1940年的军官花名册上看到如下记载：

姓名：蒋在珍。年龄：四十四岁。籍贯：贵州桐梓。

按此花名册登记年龄推算，蒋在珍生于1897年，指挥新八师于花园口掘堤时，年龄为42岁。

不过，根据乔学文的回忆和《新华日报》记者熊汇莘《陇海风云》一文中的

片段记载,读者也许大概可以了解蒋在珍其人。

花园口乡京水镇农民乔学文(1991年采访记录):

咱家那时买的马家的房子,前面是围墙,有门楼,一进院分东西厢、三间上房带走廊,全是青砖小瓦盖的,黄河扒口后,房子全给大水冲了。

蒋在珍是正月十九来的,五月十一走的,在俺家住了三个多月,新八师一个师就驻在京水一带。

蒋师长四十多岁,中等个,黄长脸,身体很壮实,他住在俺家上房里,一到近晚,他就穿着便服,出来散步。他散步时,一路上都撒着岗。他平时很少跟老百姓说话。

蒋师长枪法很准,有一次,天上有一只鸽子飞过,他也不瞄准,随手把枪一举,一声枪响,那只鸽子就被打下来了。

扒口前的那天早上,蒋师长走进东厢房跟俺老母说了一回话,现在俺还记得。

蒋师长说:你家有几口人?

俺老母说:三口呗。

蒋师长说:村上有没有亲戚?

俺老母说:没有。

蒋师长叹了口气,说:你这后手也太软了。

俺老母说:那也没办法。

蒋师长愣了一会儿,又说:你们搬个家,到别处安个小家庭吧。

俺老母说:俺们住得好好的,为啥要搬家?

蒋师长说:这你就别问了。

他说完就走了。在这以前,他从来没和俺一家人说过话。

后来,俺们才知道新八师在花园口扒开了黄河堤。

.....

《新华日报》记者熊汇莘在《陇海风云》一文中记述:

……次日,经过三十里的步行,到了××镇,此地是郑州西北一个重要渡口,××师在这里驻防。首先由该师的政训处周处长接待我们。这里政训工作的同志很是活泼,尤其对话剧方面,很下过一番工夫,对士兵的教育,也经常开小组会。但对民众

工作，则因“权力的限制”未能过问。他们也认为是憾事。

后来拜谒师长蒋××先生，首先对他致敬，继则报告后方的情形。蒋师长态度谦诚而严肃，行动果敢而镇静，一眼望去，便知他是一个久经战场的英勇将帅。他是贵州人，士兵们也多是川黔一带。从前贵州人吸鸦片的很多，但在蒋师长鞭策之下，这里绝无这种风习。虽然士兵们的物质生活相当不充分，服装也欠一律，但是将士们那种活跃的神态与坚决的意志，是令人敬佩的。

我们由蒋师长率领，将所带的慰劳品送给士兵。他们来此已好久了，还从无人前来慰劳过。当他们接到这些精神食粮的供给，真不知怎样快活。

河南的天气，纯属大陆性，中午热得比江南的中暑还甚，夜间则似西北落叶的深秋。风沙太大，无论是室内还是身上，总是积满了很厚的尘埃，眼都很难自然地睁开，十里以外，就很难辨清目标。遍地都是沙土，青草真是稀宝了。

我们站在黄河岸边，注视着万里长空和滚滚的河水，广大的平野里，只有单调的风声与水声，仰首北望，不觉黯然魂销。我们在岸上默坐，而蒋师长则在用望远镜观看我们游击队的踪迹，他一点也不愿荒废时间，诚令人起敬。

在这苦劣气候的沙滩上，我们的哨兵和部队，丝毫没有怠惰，他们的目光，老是望着对岸敌人的动向，无论是暴风雨之夜还是正午。有时他们所站的战壕，被风吹得两腿都埋在沙灰里，而他们仍亭亭地直立着。恶劣的天气，也就是敌人偷渡的好机会，将士们当然要随时警惕。师长则每夜必亲至河边巡视一周，回来时已是鸡鸣之晓了。

前方的将士是这样生活着，后方的同胞应当对自己加一番检讨！

在师部里用晚饭，师长很荣耀地说：“我们做菜用的酱油，都是太阳牌的。上次我们游击队在北岸歼灭了不少敌人，同时得到大批物品，就是酱油，还能够吃一月多哩。”我们听后，真兴奋极了。

临别时，我们问蒋师长对后方民众的意见，他只简单而痛快地说：“我们现在只有一个‘干’字。朋友们，你们‘干’了没有？”

.....

4. 为活命父老赶来抗议，怕造孽百姓不愿助工

新八师动手掘堤的首日，天又转阴，上午9时左右，雨霏霏飘落，大河上下，又变得烟雨迷蒙。

但是，由于蒋在珍和副师长朱振民均亲临堤上监督施工，与大家一样置身雨中，掘堤官兵无一懈怠。

蒋在珍为使掘堤士兵不致因窝工和疲惫而影响工作，在两团中挑选800名身强力壮的士兵，分成数组，每组工作两小时，依次替换，搬运土石的员工，也以连为单位，进行轮番作业。

掘堤工地上，气氛紧张热烈而又井然有序。

但是，近午时分，堤下却出现了混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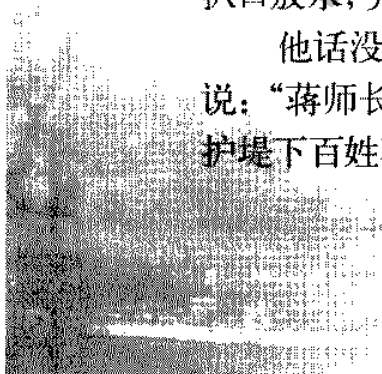
由于花园口核桃园、胡家屯^①、南月堤等村庄均在大堤附近，军队在堤上掘口，村里的百姓看得一清二楚，加之黄委会张段长又于早晨带领士兵于附近村庄召集百姓上堤帮助掘口，“‘中央军’要扒口放水”的消息在大堤附近一带迅速传开。自上午9时许，就有百姓络绎不绝赶来，男女老幼先是远远围观，后来人越聚越多，几位地方绅士和族长模样的人，竟不顾岗哨的阻拦，要上大堤见蒋师长，请他命令部队停止掘堤。

新八师在京水一带驻扎了三个多月，百姓都知道师长名叫蒋在珍。

蒋在珍见堤下百姓吵吵嚷嚷，不知他们为何事而来，接到哨兵报告后，便叫第二团团长王松梅前往劝散。

王松梅下了大堤，来到百姓面前，清了清嗓门，高声说：“父老乡亲们，国军扒口放水，完全是为了……”

他话没说完，便被一片哄闹声打断，随后一位银髯垂胸的老者走到他面前，说：“蒋师长，我们居住此地多少代，为修筑黄河大堤不知流了多少汗，为的是保护堤下百姓不受黄水之害，可你们竟要在此扒口，可知河水一旦泛滥，将要有多少



人家破人亡，为千万小民生命计，我们请蒋师长收回成命。”

“我不是蒋师长，”王松梅说，“不过我可以代表师长告诉各位父老们，政府很快要派人来放赈，救济大家。扒口放水还要一两天时间，你们可以在出水之前，抓紧时间搬迁。”

“政府能给多少钱，叫俺们往哪里搬？”他话刚说完，百姓们便七嘴八舌嚷道：

“俺在外一无亲二无友，离开家还不是饿死呀？”

“眼看到口的麦子就要被水冲掉，往后俺吃啥哩？”

.....

银髯老者抬了抬手，示意大家不要乱嚷，然后说：“小民靠田舍为生，洪水所到之处，田舍将荡然无存，靠政府那点救济，百姓们日后还能不能盖得起房屋，置得起田地？要是盖不起房，置不起地，将来岂不仍是死路一条吗？”

“老先生，你不能这么说，国军扒口放水，是为了阻挡日本鬼子的进攻。小鬼子现在已经打到中牟了……”王松梅说。

没等他把话说完，一个中年汉子叫道：“要是靠放水就能挡住老日，还要你们军队干啥哩？”

王松梅一时语塞。

百姓们怨声又起。

蒋在珍见王松梅不但没能劝散百姓，反被百姓团团围住，生怕时间长了，人越来越多，影响堤上施工，便走下大堤，替王松梅解围，并想试图把百姓劝走。

他来到人群跟前时，有认识他的百姓便喊：“蒋师长来了！”这一喊，百姓顿时静了下来。蒋在珍站在一道田埂上，高声说：“父老们，乡亲们，扒口放水是上峰的命令，不是我蒋某人可以随意更改的。现在日寇已经打到中牟县城，为了更好地进行抗战，我们的大部队已经按照上峰的命令向西转移，如果不放水阻挡敌人，他们很快就会打到此地。日寇每到一地，烧杀奸淫，无恶不作，恐乡亲们早有所闻。我要问问乡亲们，你们是坐在家里等着日本鬼子来烧来杀，还是丢掉两间房子，丢掉那些坛坛罐罐，逃得一条性命好呢？”他说到这里，停了一下，仿佛要给百姓们一点时间，好对他指出的两条路、两个结果，做出权衡选择。

他的话也的确引起了反响，百姓们以及几位老者开始窃窃议论。

少顷，他接着说：“古话说得好：‘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我们人还活着，房子被水冲了，可以再盖；坛坛罐罐丢了，可以再置。我劝乡亲们还是回家准备一下，赶快离开这个地方吧。”

蒋在珍一番话起了作用，几位地方绅士和族长经过短时间的磋商，竟反过来

动员百姓回村准备迁移。

百姓们见“权威人士”的立场已经改变，也都无话可说，不多时，便相继离去。

蒋在珍为防止百姓再来围观或要他“收回成命”，待百姓们散去后，便命令政训处人员分头率士兵到附近各村，宣传“日寇即将打来”，动员百姓迁移。并派一个团担任警戒，把周围10华里以内的百姓强令隔离，不许他们再来河堤，干扰施工。

不该来的百姓不召自来，该来的百姓却姗姗来迟——张段长带领几名士兵，跑了几个村庄，直到午后，才带回数十名百姓协助掘堤，而且其中有不少是年老体弱者。

张段长向蒋在珍报告了召集百姓时遇到的困难，蒋在珍苦笑一声，说，“来多少算多少吧，这事指望老百姓是不行的。”

张段长召集不来百姓的原因很简单，那就是河下农民不愿意“造孽”。

郑州市郊毛庄乡东赵村农民孙光耀（73岁）还记得当年国民党军拉百姓上河堤扒口的情景（1991年采访记录）：

进了五月门（农历），庄户人就忙了，又要收麦打粮，又要整地栽秧，村子里家家户户，只留下年纪大的看门带孩子，劳动力都下地了。中央军一到村上，就问保长要人，事先也没说是上河堤扒口的。那时咱村有三个保长，保长下面还有甲长，保、甲长就挨家派人，不去不行。

到了晌午，中央军在东赵村一带召集了几百人，我也去了。

老百姓跟着当兵的往河堤上走，没走多远，遇着从河堤回来的人，说是当兵的在河堤上扒口了。

大伙一听就明白了，当兵的是叫我们上河堤扒口的。胆子大些的人有的说：那是造孽呀，咱们可不能干。有的说：扒口放水，明儿可要断子绝孙该雷打呀。他们这么一喊，队伍跟着就乱了。

当时地里的高粱已经起来了。好些人趁当兵不注意，钻进了高粱地，跑哩。当兵的看见了就吆喝，吆喝也不行，人一进高粱地就没影了。当兵的又不能扔下队伍去追他。再说也没法追。等到了花园口村，老百姓就剩下几十人了。

我们到堤上，主要是帮部队运土，晚上就住在河堤上。部队挖了两天两夜。刚刚挖好时老窄，后来又用炸药炸，水才出来。

① 胡家屯，简称胡屯，位于核桃园村东端，1724年和1866年，这里曾有两次泛滥。1938年花园口掘堤后，该村房屋全部冲毁，村名永远从地图上抹去。

5. 掘堤成功水流小，扩大缺口用炮轰

花园口黄河大堤和赵口一样，经沿河居民累年修护，堤内侧有斜面石基，大堤主体则为土石混筑而成，十分坚固，士兵们挖掘颇为吃力，而阴雨天气又给施工带来困难。士兵们虽身着一色军装，但使用工具却是各式各样：掘堤士兵用的是圆锹、十字镐、钢钎、铁锤、锄头；运土石的士兵则用箩筐、土箕、扁担、木杠。这些工具大都是临时从百姓家找来，施工期间多有损坏。蒋在珍又命张段长带人到附近村庄搜集掘堤工具，以供替换。一天下来，仅用坏的工具就有很大一堆。

为使士兵便于施工，并可投入更多人力，蒋在珍命在缺口两侧作阶梯状挖掘。

到了晚上，蒋在珍又命士兵将汽车开至工地东西两头，打开车灯照明，以利施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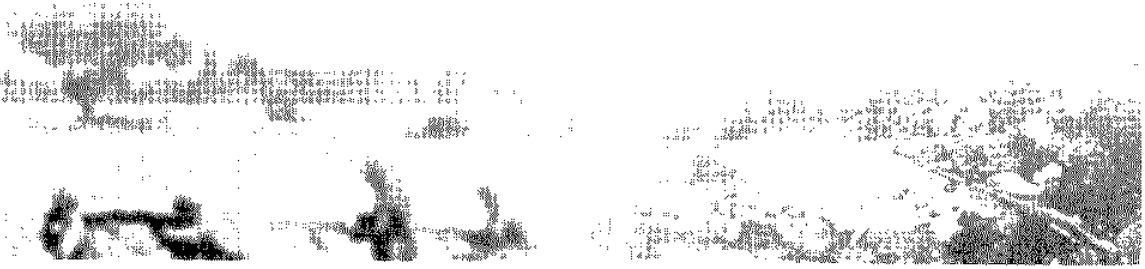
由于日军加紧向平汉线突进，郑州形势危急，附近部队正加速自行破坏难以运走的辎重设备以及车站以东的铁路。剧烈的爆炸声彻夜未停，冲天火光遥遥可见，使掘堤工地上的气氛更为紧张。

6月8日，新八师师部移驻东赵集，驻京水一带未参加掘堤的部队也奉命东移，以免被即将脱堤而出的洪水所困。

上午10时左右，两架敌机自新乡方向飞来，在花园口上空侦察。敌机嗡嗡的马达声使掘堤士兵情绪顿转紧张，但掘堤工作并未因敌机的出现而停止。

敌机也许是认为地面驻有高炮部队，未敢低飞盘旋，只是向村落中盲目投弹数枚，然后向北飞去。

由于昨夜赵口后两道缺口放水失败，蒋介石、程潜、薛岳、商震等人，均把希望寄托于花园口，询问掘堤进度和督催加紧施工的电话不断打来。蒋在珍不得不派人专门接电话，向他们报告掘堤情况。



花园口掘堤于8日进入高潮。早晨8时许,“战地服务队”男女同胞来工地进行慰问演出,唱“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唱“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唱“牺牲已到最后关头”……

工地上,号子声与歌声相混合,气氛十分热烈。

11时许,魏汝霖又从郑州赶来,代表商震向掘堤部队表示慰问,当众宣布:如于本夜12时放水,商总司令奖法币2000元;如明日午前6时完成,则奖1000元。并对蒋在珍计划周密,抱恙监工,以身作则大加赞扬。

此后,魏汝霖一直在堤上监督施工。

至傍晚时分,缺口已掘下20米左右,花园口掘堤,眼看就要成功。

但是,大堤内侧的斜面石基础筑坚厚,靠人工挖掘十分困难。而师属工兵连并无工兵装备和爆破材料,掘堤士兵面对坚韧的石基护坡一筹莫展。

后来,工兵连连长马应援提出用水缸或铁锅装满炸药,然后深埋于石基之下,可以充分发挥爆破效力。于是蒋在珍便命士兵连夜到附近百姓家中去找水缸铁锅。

9日清晨,两天未散的阴云,化作片片灰色残絮,舒卷四绽,钢青色的天空从云隙中袒露出来,东方被即将升起的红日染上一片胭脂色。阵阵鸡鸣声从村落中传出,黄河像往常一样,从晨曦中展现出它宽阔的河面。

大堤上,一道上宽50米,下宽4~5米的缺口已经挖成,掘堤部队已撤离施工现场。原先停在工地东西两侧的汽车也熄了灯,开向远处。工地上,仅有一些士兵在大堤内侧做爆破斜面石基的准备工作。

6时许,工兵们点燃了炸药的导火索,迅速离开了现场。

片刻过后,剧烈的爆炸声震碎了清晨的沉寂,大堤上,团团浓烟冲天而起,石块尘土四散迸飞,沿岸居民多年修筑的护堤石基在持续不断的爆炸声中彻底崩溃。

爆炸声停止后,施工部队立即返回大堤,开始搬运被炸药炸开的土石。

由于放水在即,蒋在珍与魏汝霖、熊先煜等人,已与第二、三团大部分官兵移驻于花园口以东村庄,剧烈的爆炸声把他们从睡梦中惊醒,蒋在珍即派熊先煜去工地察看爆破情况。

7时之后,熊先煜回来向蒋在珍报告:爆破效果良好,口门土石即将清除完毕,很快就要出水。

蒋在珍和魏汝霖心情振奋,喜形于色,当即乘车沿大堤赶往掘堤处查看情况。

不知是因为缺口附近土石零乱,道路不平,还是由于心情过于激动,蒋在珍



下了汽车，向缺口疾步走去时竟跌了一跤，脚踝也因此扭伤。开始他尚能勉强行走，后来每走一步，便疼痛难忍，不得不让勤务员弄了一根拐杖以保持身体平衡，以致使他后来出现在东赵集时，百姓们误以为他是个瘸子。

蒋在珍、魏汝霖、熊先煜来到缺口边上，口门的土石大部已被运走。河水已溢入缺口，士兵们正在船上挖除最后一道挡水的土石。

8时左右，口门的土石全部清除完毕，黄河之水从缺口缓缓流出。官兵们立于缺口两旁，个个神情肃穆，无一人喧嚷。也许此时此刻，他们正想象着黄水泛滥后的景象吧。熊先煜在“抗战日记”中写道：“当放水之瞬间，情绪紧张，悲壮凄惨”，虽仅寥寥数语，却也能大概反映出当时的场面。

蒋在珍立于缺口旁，看看北面奔腾的黄河，又看看南面一望无际的田园，一时默然无语，若有所思。

片刻过后，他仿佛想起了自己的职责，他觉得水流太小，命士兵继续将口门扩大。然后，他跛着足走进堤上的临时指挥所，以电话向商震报告：花园口掘堤成功，已于8时出水。

商震连日来既要指挥中牟南北一线战事，又要督催掘堤事宜，心情焦躁，夜不成眠，嗓音已变得有些沙哑。他听到掘堤放水已经成功，也颇振奋，当即在电

话中表扬蒋在珍一番,并表示,新八师官兵能在短期内完成任务,劳苦功高,发给奖金2000元。最后,商震又命令蒋在珍逐日向他报告决口的宽度、流速、流量、水头到达地点及其深度等等。

蒋在珍表示一定照办。(蒋后来按照商的命令,派一名参谋负责,每日驾一小船调查测量黄水泛滥情况上报,多日乃止。)

随后,蒋在珍又以电话向驻郑州的薛岳报告了放水成功的消息。

8日上午,魏汝霖从郑州来到河堤视察之前,商震就对他说,掘堤放水,势必给广大民众带来灾难,实属“冒天下之大不韪”,只有把决堤一事嫁祸于日寇飞机轰炸所致,才可暂时掩天下人耳目。魏汝霖来到花园口,见放水有望,便将商震之言转告蒋在珍。蒋在珍遂命师政治部秘书长刘松生拟一电稿,准备放水时发向武汉。其电文是:

武昌委员会蒋(密)本(佳)日上午八时,敌机三架炸开花园口河堤,职师正在抢堵中。职蒋在珍叩佳已,参战。

现在,是向武汉拍发这份假电报的时候了。蒋在珍给商震、薛岳打了电话以后,便又打电话给师部,命令参谋处立即将电报发往武汉。

当然,这封电报不过是给蒋介石在答记者问时提供一个“根据”而已。

9时之前,上至最高统帅,下至薛、商两总司令,都获悉了花园口放水成功的消息。

但是,奉蒋在珍之命,继续扩大放水口门的士兵,工作却无什么进展。因为缺口底部经河水一泡,土质变松,无法站人,即使勉强挖去一点土方,也无济于事。若再用炸药爆破,已经出水的口门反会被炸塌的土方堵塞。王松梅与彭镇璞两团长问工兵连连长马应援有何良策,马应援也无可奈何。

蒋在珍为此颇为焦急。后来,黄委会张段长说,口门经流水冲刷,会自行扩大,他才稍稍放心。

10时许,驻扎于郑州附近,尚未西撤的胡宗南第十七军团所属第一军军长李铁军,突然驱车赶来大堤,声称奉委员长之命前来视察放水情况。

原来,蒋介石接到蒋在珍的电报后,即打电话向商震询问缺口出水情况。当商震向他如实做了报告后,蒋介石竟责备说:“启予兄,水行太慢,水行太慢,像这样的流速,什么时候才能流到陇海铁路以南。”

电话挂断之后,生性多疑的蒋介石竟怀疑掘堤并未成功,于是他又以电话命令亲信将领胡宗南部下李铁军,速往花园口,视察缺口出水情况。

李铁军来到大堤缺口处，见到蒋在珍、魏汝霖等，对新八师官兵的苦干精神不赞一词，便下车伊始道：“这样小的流量，简直是狗撒尿，狗撒尿！”

蒋在珍闻言，心中不快，但碍于李铁军是委员长派来的“特使”，不便顶撞，便忍住胸中怒气，向他解释，现在以人工对口门进行扩大颇为困难，缺口红水冲刷，很快就会自行变宽，云云。魏汝霖和张段长也在一旁帮腔。

李铁军一脸责人之色，这才渐渐收敛，半信半疑地上了车，回郑州向蒋介石复命。

但蒋介石仍不放心，直至数日后，还派胡宗南到花园口一探虚实。不过当胡宗南携参谋长罗列来到大堤时，口门已经扩大数倍，黄河之水，奔腾而出，滔滔水声，遥遥可闻。不用蒋、魏等人解释，事实已足以证明放水的确十分成功。胡宗南在大堤上转了一圈，便与罗列驱车而去。

程潜是稍迟接到商震放水成功的报告的。他也认为水流量太小，迟迟不能于平汉线以西形成泛滥地带。遂电令蒋在珍：“于本午十二时左右，再对石坝进行爆破，使流速加大。”

蒋在珍接到程潜电令后，便命工兵连执行爆破任务。工兵连长马应援面露难色，说：“先前爆破成功，是因为斜面石基内土方全部挖除，所以一举成功，现在再行爆破，炸塌的土方说不定会堵塞口门，反把事情弄糟。”

“能否从缺口两侧进行爆破？”蒋在珍问。

“恐怕也难以奏效。”

“为什么？”

“因为炸药需安放在缺口底部才能将其炸宽。但现在已出水多时，两壁松软潮湿，无法安装炸药。若将炸药安放位置抬高，一是恐将缺口上端土方炸塌，二是缺口底部的有效宽度并不能增加，结果还是徒劳。”

蒋在珍又同魏汝霖、熊先煜，以及王松梅、彭镇璞两团长紧急磋商，均想不出妥善办法。

此时，中牟已经沦陷，日军正沿陇海铁路向郑州附近的白沙镇推进，炮声如同天边滚雷，隆隆盈耳。工兵连连长马应援忽动灵机，对蒋在珍说：“依我看，师座不如请商总司令派炮兵部队前来相助。以大炮向缺口底部集中轰击，也许能够成功。”

蒋在珍想了想，说：“好，我们试试看。”说完便到临时指挥所打电话，请求商震派炮兵帮助扩大口门。

但是商震却答复说，现在部队均位置于中牟南北一线，正与敌激战，无炮兵可派，叫蒋在珍请示薛岳，由他从守卫郑州的部队中调炮兵支援。

蒋在珍随即打电话向薛岳请示。薛岳问明情况后，立即同意派炮兵开往花园口。

近午时分，一个平射炮排由一名炮兵连长率领，开到花园口大堤下。

蒋在珍命堤上人员全部疏散，然后向炮兵连长说明意图，该连长便命炮兵瞄准缺口，开始轰击。

震耳欲聋的炮声持续了十几分钟，炮兵一连发射六七十炮，缺口东西一段大堤，被蔽于滚滚硝烟之中。

此法果然有效，缺口被炸宽两丈左右，由于炮弹是陆续落在缺口两侧，而不是像工兵那样以炸药同时爆破，炸塌的土方大部分被水冲走。炸宽的口门，水势骤然增猛，浊流汹涌而出，被炸弹爆炸震松了土石的缺口两侧在逐渐崩溃扩大。决堤而出的黄水，浪花翻卷，漩涡团团，向东南一带田野村舍滚滚涌去。

至下午2时左右，花园口一带，已成一片汪洋，京水镇以西及北面村野，尽成泽国。

滔滔黄水，如同挣断锁链的黄龙，张牙舞爪，挡住了日军的西进，同时也开始向豫、皖、苏三省人民逞示它的淫威。

